

这个春天,汪曾祺诞辰百年

400万字的《汪曾祺全集》 本应还有一部“汉武帝”



汪曾祺(1920年3月5日~1997年5月16日) 人民文学出版社 供图

学者孙郁曾说过,当代作家有两个人去世以后的书再版最多,一个是汪曾祺,一个是王小波。

今天,就先说一说汪曾祺。2020年3月5日,汪曾祺诞辰百年。

汪曾祺的文字,是合适在这样春日拿出来读的。为什么汪曾祺能被后来的无数读者喜欢,依然用孙郁的话来说——

他在没有意思的地方发现意味的东西,他创造一种美,他使我们感觉到生活如此美好,面对黑暗,他用一种美的东西去克服黑暗。

他本计划写长篇小说“汉武帝”

刚过去的2019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400万字的《汪曾祺全集》——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、题跋等日常文书,共分12卷:小说3卷,散文3卷,戏剧2卷,谈艺2卷,诗歌及杂著1卷,书信1卷,并附年表。

“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那些东西给召唤出来,他成为我们当下社会最急需的精神营养,而且他充满了智性,在审美方面,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,汉语言文字的经验,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有现代性的东西,古今打通。而且他的文字非常有魅力,我们读他的文字会想到从六朝以来中国人的文章的气脉,他把这个衔接下来了。而且他又有很高的智慧,他对世俗社会的认识,他在世俗社会里面能发现美,而且又超越世俗……”

这是孙郁在这部“大书”的首发式上,说过的一段话。

从1940年到1997年,汪曾祺的创作生涯达一甲子,《汪曾祺全集》是他的文学遗产面貌的全面反映。但是,《汪曾祺全集》中独缺长篇小说。

最近,因汪曾祺诞辰百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邀约了一批汪曾祺研究学者来“说一说汪曾祺”,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的笔下,我们得知,原来,汪曾祺曾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《汉武帝》,只是因种种原因,未能完成。

写出汉武帝这个“人”来,难

汪曾祺对汉代文化的兴趣,自幼就已种下。

后来,无论是他在1962年创作京剧《王昭君》,还是此后萌生的创作历史剧《司马迁》的想法,在他的内心应该都是与《汉武帝》的创作体系有关。

徐强教授认为,1981年6月7日,是汪曾祺离汉武帝计划的“实行”最近的一次,却终于没有实现——

他在给朱德熙的信中,透露将有承德之行,准备在彼地“写一个中篇历史小说《汉武帝》的初稿”,行期就在几天之后,汪曾祺显得很有把握,虽然这次稍为保守地拟为“中篇”,但情况仿佛是努一把劲就能呼之欲出似的。

在承德小住期间,汪曾祺写的是系列小

说《故里杂记》(包括《李三》《榆树》《鱼》三题)。是因为这几个题目成竹在胸吗?

徐强教授的观点是——似乎不是,因为他曾对稍后到达的林斤澜说过,写这几篇小说过程中“曾几次撕掉稿子”,看来写得并不顺利。那只能说明《汉武帝》酝酿尚不成熟。

不过,这个创作冲动却萦回不去。

1981年秋,汪曾祺返回阔别40年的故乡高邮小住,还曾对常来闲聊的高邮文学青年金实秋提起创作长篇小说《汉武帝》的计划。

1983年9月8日,汪曾祺在致陆建华一封信中较详细地谈到这个计划的新“动向”:

明年,将试试写一历史题材的长篇《汉武帝》。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。他们来要我写长篇,我因写戏故,曾翻阅过有关汉武帝的材料,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,我对他很感兴趣,就随便说了一句:“现实题材的长篇我没有,要写除非写汉武帝。”不想他们当了真,累来催促。这个所谓“长篇”的希望是很缥缈的。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,说很难写。但我要姑且试之。不成,就算了。这样,明年我大概还不能走动,将钻进故纸堆里。

这一年,他数次在和亲友的通信中说到这个计划。

到了1984年,这一年的2月2日,汪曾祺为朱德熙作荷花图,附言中也说到:“今年不拟多外出,啃一块硬骨头,写出小说《汉武帝》。”

徐强教授认为,从创作行年看,1984年比起此前几年来说,是汪曾祺小说写作的荒歉之秋——全年仅作《拟故事》(二题)和《日规》两篇,都算“小制作”,此外是以昆明题材为主的散文和几篇文艺杂论。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把较大精力用于《汉武帝》的构思和深入准备中,像他所说“钻进故纸堆里”。

他还专门给泌尿医学专家吴阶平写信,列出六个问题请教“宫刑”的详细情形。9月,接到了吴阶平的回信,回答了部分问题。这样的准备不可谓不精心。许是所谓“意翻空而易奇、言征实而难巧”之故,实际中遇到的麻烦也是空前的。在8月16日致陆建华的信中,他再次详谈到:《汉武帝》尚未着手。很难。《汉书》、《史记》许多词句,看看也就过去了,认起真来,却看不懂……历史小说很难作心理描写,而我所以对汉武帝有兴趣,正因为这个人的心理很复杂。我想在历史小说里写出“人”来,这,难!

1986年7月,《北京晚报》的记者采访汪曾祺时,问及有无长篇创作计划,他“悄悄透

露”了酝酿已久的《汉武帝》计划,说:“此人性复杂。一生功过纷繁,把历史人物写得简单化万万要不得;另外汉代语言习惯、典章制度、起居跪拜均需细细考察,因此动笔还无定期。”

笔记本上的提纲被香烟引燃了

《汉武帝》再次进入搁浅期。1987年,汪曾祺赴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三个月。

徐强教授认为,对久已酝酿的《汉武帝》来说,这本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写作时机,但汪曾祺却投身于《聊斋新义》系列的改写,《汉武帝》自此开始明显地少见提及。

时间跨入1990年代,七十岁以后的汪曾祺,常常在生日前后提到《汉武帝》,比如,1990年2月,汪曾祺曾说:“我不愿当什么‘离休干部’,活着,就还得做一点事。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,一本短篇小说集,把《聊斋新义》写完,如有可能,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汉武帝》写出来。这样,就差不多了。”

而且,他这一期的诸多散文中,汪曾祺也对汉武帝念念不忘。

1996年5月10日,高邮金实秋赶到宅访问汪曾祺,再次询以“是否还想写汉武帝”,他说:“写不成了……一次我把烟搁在笔记本上,笔记本是塑料皮的,烧起来了,提纲在那个笔记本上。”

徐强教授说,这是目前仅见的汪曾祺提及《汉武帝》已有“提纲”的说法。一年之后,汪曾祺逝世。一个间接积累大半生、直接酝酿了十五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,就此永久消歇。

那部胎死腹中的《汉武帝》给我们留下的,除了无法弥补的缺憾,在徐强教授的眼里,还有难禁的悬揣和深沉的文学史迷思:它的缺位,究竟让我们错过了什么……

本报记者 孙雯 整理



小时新闻APP

更多精彩内容
请扫码提取

